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 全球大变局及疫情后的公益与社会责任 ——观察与思考、创新与实践



今天我希望与大家分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收入与财富不均的问题。第二,可能的应对之策。第三,长江商学院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收入和财富不均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最近世界经济论坛、OECD等权威机构针对颠覆式科技对于收入和财富不均的影响做了研究,主流的观点是新一代的颠覆式科技发展可能会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均。世界银行、联合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的研究报告共同认为新冠疫情也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均。

收入和财富不均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大挑战,中国的应对之策其中很重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除脱贫攻坚以外,企业在价值取向方面也需要做一些比较大的调整。去年8月,180余家全球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上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重新定义公司运营的宗旨。股东利益不再是

公司唯一的重要目标,企业需要在促进社会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确立自身的社会目的。面向未来,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的同时,要更多关注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不仅关注如何做生意,同样关注为什么做生意,以及财富的使用和分配。此外,中国也需要建立更为合理的企业群体结构,大力发展B类企业,形成“家族企业(A类)+现代企业制度(B类)+国有企业(C类),A+B+C组合”组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群体结构。B类企业的诞生可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社会结构的必要条件,对共同富裕至关重要。

从三次分配来看,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使得二次分配变得更为重要,需要通过更为积极有效的、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解决由一次分配引发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同时,三次分配,即公益及捐赠的文化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长江商学院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理论探索、引领式创新与实践。

长江商学院社会责任 1.0: 由心而生,培养同理心、人文关怀和长线观。

从创办第一天起,长江就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早在2005年,长江率先将人文课程(历史、宗教、哲学)系统地引入管理教育,这可能是全球第一家商学院系统倡导和发展人文教育。希望借此能够引领世界管理教育由“术”而“道”,培养具有

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商业领袖,弘扬历史观与长线思维,以商业和社会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长江商学院社会责任 2.0: 意识与习惯的培养,捐赠与公益课程。

一直以来,长江都重视引导学员关注财富的整个循环,从为何经商、如何经商,到如何使用财富。2010年起,长江商学院全球首创EMBA 48小时公益学时制度,学员必须完成48小时公益活动方能毕业;2014年起,再度首创式地将公益和社会责任课程作为EMBA的“开学第一课”;2017年起,在MBA、FMBA等学位项目中引入24小时必修公益学时及“公益第一课”;同时,长江首创立公益奖学金(2002年)、长江公益基金(2009年)、长江公益奖(2014年)等引领式创新,不断拓展商学教育逻辑,重视公益课程与社会责任。截至今年4月,长江校友企业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中捐赠资金和物资累计超过40亿元。同时长江在老区精准扶贫整体方案的探索方面和江西吉安政府深度合作,也做了一些探索。无公益,不长江,公益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长江人的DNA。

长江商学院社会责任 3.0: 弘扬跨界协作及创新,系统地解决社会问题。

近年来,全球均普遍面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与阶层固化,可持续发展等三大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政府、企业或非政府组织中的任意一

方都无法独自、有效地解决。三者必须通力合作,协作创新,以科技、商业、社会创新等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基于这一点,2018年起,长江将传统的公益和社会责任提高到新的高度,再次开创性地将社会创新课程列为所有学位项目必修课,倡导企业不仅为了创富而追求创新,也要为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而探索创新,推动构建和谐社会。

长江商学院社会责任 4.0: 全球担当—为全球培养重视社会创新的经济新生代颠覆性力量。

面向未来,长江把责任担当的视野从中国拓展到全球,致力于为全球培养一批重视社会创新的经济新生代颠覆性力量,为全球问题贡献中国解决方案和中国智慧。聚焦收入和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为年轻人提供上升通道与可能,为全球重大问题贡献源自中国解决方案。

在国内,2019年6月长江启动了学位课程中文MBA项目,也是第一个聚焦培养新生代经济颠覆力量的MBA项目。在欧洲,我们希望通过两大项目为欧洲培养新生代颠覆力量:一个是“启航中国(China Start)”项目,已经成功执行了八期;另一个是与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共同推出的“Igniting Innovation for Impact”项目,致力于培养有责任感、未来领袖。在亚洲,面向东盟商界领袖,长江先后推出东盟新经济领袖课程、东盟全球领导力课程等。未来,我们也希望陆续

推出一系列面向日本、韩国、东盟、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的项目,一步一步打造一个能够培养经济新生代颠覆力量的全球生态体系。

长江商学院通过一系列的全球引领式的探索推动了管理教育创新,并为全球重大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源自中国的解决方案。

第一,实现商学院“客户群体”的拓展:从职业经理人培养到企业领军人的学习与修炼,到经济上新生代颠覆力量的培养。

第二,系统地引入人文课程、推动管理教育由术而道、并为商业决策注入了历史观与长线观、为应对气候变化/人类的集体短视作出贡献。

第三,传统商学教育聚焦如何经商与挣钱,长江商学院关注财富的整体循环:为什么经商、如何经商以及财富的使用与配置。弘扬商业与财富向善。

第四,提出儒家经济圈、并为东亚(中日韩及东盟十国)以及RCEP区域的一体化及深度合作做出贡献。

第五,长江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创新的引领者和践行者,我们将通过社会创新,把政府、企业、社团组织、市民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整合起来,系统地解决收入与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问题。

第六,构建培育经济上新生代颠覆力量的全球生态体系,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上升通道,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方案。

长江证券公司创始人、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陈浩武:公益精神与社会责任



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公共精神的匮乏。中国人是比较缺乏公共精神、公共关怀的民族。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大家可以讨论。我认为目前来讲,中国的公益事业应该确定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去推动社会公共精神的发展。什么是公共精神?就是普遍的利他主义,普遍的公共关怀,普遍的向善意志和所谓的“金规则”,即中国古人所强调的一种价值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在轴心时代所形成的文明最重要的就是普遍向善意志,从孔孟开始,这种向善意志就非常鲜明,到明代、宋代的时候,王阳明所综合的新学核心就是三个字:致良知,这就是一种向善意志。

怎么建立这个公共精神?有三个方面:第一发展教育,第二是建设社会共同体。我们的社会共同体太少,它是分散为主体的,其实人的公共关怀是基于对共同体的认同,所以建立更多的共同体是建立公共精神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三是要发展公益事业,这是当前的主要话题。

在中国来讲,新时代的公共精神天然的承担者是谁?是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在努力推动建设公共精神,但是相对发达国家来讲,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企业家应该是天然的公益人,因为企业家热心公益,有着共同的情怀和使命感。企业家必须成为热衷于推动公共精神建立的承担者,因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

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打破了共同贫穷的一声惊雷。但是小平同志也说,先富起来是一种策略,先富起来不是目的,先富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带动后富者。如果先富不能带动后富,改革开放的先富政策就等于是失败了。首先打破共同贫困,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又给这部分人提出一项道义责任,就是必须要推动社会的公平。所以先富一代在当下来讲应该有一种更加悲悯情怀,先富一代应该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应该具有更多的公共关怀,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应该践行“金规则”的带头人。西方有一种价值观是清教精神,清教精神说了三句话:拼命地挣钱,拼命地节省和拼命地捐赠。

他能够挣钱,证明他有能力,证明他有更高的社会责任,但他挣钱的目的不是把它换成银子埋在自己床底下,而是对社会完成他们的义务。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提高学习能力,我认为清教精神也好,公益精神也好,并不是西方企业家的专利,中国商人社会传统的责任正在随着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崛起而崛起。

我认为中国的当下是中国企业家推动建立公共精神的最佳时机,这个最佳时机不仅仅为了实现第三次的财富分配,而是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更高的、更加和谐的、更加公平的、更加平等的一种社会,我们大家都要为此来做努力。

我认为中国的当下是中国企业家推动建立公共精神的最佳时机,这个最佳时机不仅仅为了实现第三次的财富分配,而是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更高的、更加和谐的、更加公平的、更加平等的一种社会,我们大家都要为此来做努力。